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小 田

(苏州大学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关键词]社会史;整体性;社会结构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研究》(11BZS073);2009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江南村妇生活研究》(09LSB008)

[作者简介]小田(1963—),男,江苏省苏州市人,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5-0042-06 **[收稿日期]**2011-12-25

一、问题的由来

“整体史”书写是20世纪史学革命的重要成果,而革命宣言便是所谓“新史学”。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新史学”为题,力陈旧史学之弊,揭橥“史界革命”之帜。约略同时稍晚,美国史家鲁滨孙(J. H. Robinson)以同样的标题出版著作,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让史学“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1][P12]}。让中外两位史家先后揭竿而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旧史学的残缺。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明确表达了历史所应具有的整体性:“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2][P2]}鲁滨孙亦称“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1][P1]}与梁启超被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领袖”的何炳松,1921年在翻译鲁氏著作时,非常赞同历史的广泛性,而对残缺不全的旧史学啧有烦言:“旧日史学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此外还有一种专述惊心触目的事实的趋向。其实历史这样东西,并不是小说;而且几件特别的事实,断不能代表人类各种事业的全部。又以为人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里面的。历史家对于乱事津津乐道,对于平时轻

轻略过。”^{[1][P4-5]}当1929年法国年鉴派史家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时,“新史学”始冠之以“社会史”,而整体性则成为社会史最突出的徽识。两位创始人考虑到“历史的整体”而选定了“社会”一词,并认为,“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据此不难看出,整体史其实也可称之为“整体社会史”或“社会整体史”,社会是其主词,而整体是其特征,显示了社会史的一种追求。然“整体史”何谓?或问: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特征?至今言人人殊,正如众说纷纭的“新史学”和“社会史”一样。反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史学实践,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史并非完全同质,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的,从而与传统史学相区别。

二、全面的日常要素

作为特定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历史要素纷繁复杂,社会史要求尽可能多地将其纳入考察范围。梁启超明确指出,历史学应校其人类“活动之总成绩……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

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2] [P2-3]}。他统摄精英与平民两极,强调历史要素的“总和”。后来,尽管梁氏浸渍佛教颇深,认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但“总和”历史观基本未变,他指出,“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在在都应入史,因为“历史是整个的”^{[2] [P153]}。因为致力于对传统史学的纠偏,社会史更热衷于打开某些史学的冷门。在英国,以社会史名义出现的一些论题都不是“一般历史学家研究的兴趣所在”,诸如贫困、愚昧和疾病等社会问题史,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日常生活史,普通人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妇女、儿童等相关的私域史等等^{[4] [P112]}。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史也在类似的领域扩张,而这些,在过去似乎是针对“野蛮”世界的人类学论题,像食品、身体、传说、性、仪式、社群关系……如今在社会史的旗帜下都找到了其自身生发空间。

明显地,这些要素体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关怀:前者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要素,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而后者更关注社会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性要素,如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基础、政治运行和意识形态等;一是个体意义和层次上的“行为—经历”史,一是社会意义和层次上的“过程—结构”史^[5]。匈牙利哲学家赫勒(A. Heller)指出,“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6] [P3]}。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制度性结构的角度理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与活动于结构中的主体无涉,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思,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首先表现为日常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7] [P32]}基于此,李泽厚认为“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应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所谓“历史本体”不是某种抽象物体以及理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等,而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8] [P24]}。

社会史追求历史要素的全面性,然而,全面并不等于所有,亦不同于普遍。数十年来的西方史学特别是社会史,从挑战政治—军事—外交史的统治地位开始,“极大地扩展了它的求学范畴,不再是只有某些事实才

有资格入选的领域……一切都变成了历史”^{[9] [P80]}。实际上,对于社会史来说,“一切”只是个目标:任何历史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要素,最关键的,任何历史都不应该将“一切”作为考察的对象,我们应该放弃“由于不能具有而从未具有过的”“普遍史”的想法,因为“普遍史”是指向事物本身的,克罗齐(Croce)斥之为关于“物自体”的幻觉^{[10] [P38]},而历史却是对既往事物即史实的选择。近人陈衡哲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意见:

历史既是人类全体的传记,它的范围当然很广。拿破仑的事业固然是历史;法兰西乡下的一个穷妇人的生活状况,也何尝不是历史。但我们又决不能把所有人类在空间里和时间的一切思想事业,都当作历史看待。我们须在那漫无限制的历史材料里,整理出一个历史来^{[11] [P276]}。

在撰写《西洋史》时,她给出的“历史取材的标准”非常值得参考:“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精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11] [P2]}

这里的“文化”几同于人类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这只是在确定标准,甚至对作者而言确实也只是为了确立标准,但只要这一标准以人类的生存为中心,它便在理念上具备了一个结构,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或简称为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话语中,所谓要素,即指社会要素,从属于社会结构,一切与人类生活没有关系,或者尚未发生关系的要素,都是浮云,不在讨论之列;以人类生活为中心而确立的标准,则成为社会结构的边界,社会边界内的要素才是历史要素。

人们或许对某个标准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有一定标准,否则无以选择史实。如此,社会史的所谓“全面”应该理解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充实。很明显,要素贫乏的社会,只能是结构简单的社会,——那是人类学和考古学重点考察的对象;面对业已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学自然需要充实要素;进入社会边界内的要素愈多,则社会结构的面目愈清晰,社会史愈趋向全面。作为对传统史学的反动,与个体生活相关的日常要素则是追求整体性的社会史优先选择的方面。

以上其实就是自年鉴派史学而来的一以贯之的思路:

年鉴学派所作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出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12] [P32]}。

证之以后来社会史发展的实际,学者们所“考虑到

(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明显偏向于日常生活。

三、实在的结构关系

追求整体性的社会史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历史要素的全面,更重要的是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方式,所谓结构性联系。究竟怎样的联系?新史学的思路并不一致。在1920年代的梁启超那里,结构性史学被称作“普遍史”: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2] [P43-44]}

梁启超所称“普遍史”,或“一般之文化史”,与后来西方诸种社会史界定中的一种观点——社会的历史——非常相似。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其他各种专门史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假如要理解整个社会,那就必须把各种专门史纳入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去。对于类似构想的实质,英国学者J. 布雷维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示:

把历史的不同分支纳入一个单一框架的更有希望的方法是把不同的范围区分开来,分成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然后把不同的层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这种尝试的最好的例子。韦伯所倡导的传统同样可以导致相同的趋势,尽管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把这种探讨视为社会史或社会的历史的典范是讲不通的,(但)仍然可以假定最终目的是理解“整体的社会”或一种“社会的模式”,但是这种假定对这些专门史来说并不是实质性的。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规定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围,然后把它们与各种材料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9] [P145-146]}

直到今天,试图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作为统括历史、进而取代历史的设想,亦不过是布雷维里在这里所分析的,表面上看是为了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实质上是愤然于传统史学的要素割裂,而致力于建立历史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如果社会史的结构仅止于强调历史要素之间的纵横交错关系,那么秉持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学对此毫不

陌生,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指出这种历史的联系:社会一制度意义上的抽象要素而非个体一日常意义上的具体要素之间的关联;由年鉴学派一脉而来的社会史强调的是后者,另一种结构性关联。

“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特别指出,历史“应当研究……几十年来人们称之为‘结构’的东西”^{[3] [P27]}。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他的前辈布罗代尔曾有过解释,“‘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与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其中,“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比如,某些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等^{[13] [P94]}。勒高夫则更强调“精神状态”或称“习俗、心态”^{[3] [P35,27]}。从地理到生物而意识,布罗代尔试图说明它们与“群众”生活的关系状态:

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开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例如在山区,山民有按季节易地放牧的习惯;在沿海地带,海上活动总是集中在某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地点。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通畅,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地持久和固定。^{[13] [P94]}

这里的“结构”所显示的,已经接近日常生活的关系状态。布罗代尔自称“结构主义者”,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的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14] [下卷,《结论》]}。布氏的这个解释体现了社会史一再强调和实践的两个结构特征:

一是日常要素的关联。在《地中海》中布氏“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的局部的、持久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他们之中最重要的、涉及每天的生活的事物”^{[14] [下卷,《结论》]}。从后来的“文化场”概念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日常要素的关注明显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

按人类学家的说法,“文化场”是一所房屋。在这所相当宽敞(从不过分狭窄)的房屋内,摆着各种各样的“财产”,具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从房屋的材料和形状到屋面上的尖顶,从当地的方言、烹饪口味到特殊的技术,从信仰或情爱形式到指南针、纸张、印刷术,如此等等。某些文化特征在特定场所的存在、集合和汇聚是构成某种文化的最起码的表现。^{[13] [P117]}

二是稳态的深层结构。布氏是在构建“长时段”理

论中注意到“结构”的,因而他的“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13] [P123]};深层的结构稳态正是“长时段”;因此“结构是在‘长时段问题中居首位’的关键词,‘为长时段历史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一把钥匙’”^{[13] [P94]}。

如何进行结构史的书写?选择“首先与地理学对话”^{[13] [P120]}的年鉴学派,指引着社会史走向地方社会。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局部地域的方便即在此:“同时涉及到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到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¹⁶ 16世纪的地中海恰是这样“一个单独的天地,一个整体”的世界^{[15] [P1-2]}。然而,布氏的经验表明,整体史的理想不可能在像地中海这样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实现,布罗代尔意识到“必须把这个地域分小,分析它们的不同和差异,画出轴线和‘分水岭’……但太平洋规模太大,不便于我们去分析,即使比它小一点的例子也不容易着手。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文化场始终包括几个社会或社会集团。因此,我再再说一遍,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13] [P118]}于是,“地中海区域最终也局限在法国南部的蒙塔尤”^{[3] [P135]}成就了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这样的社会史典范之作:以中世纪时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16] [P2]}。它“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一个总体结构中把一种总体历史的各不同层次结合起来”^{[3] [P139]}。勒氏相信,社区微观世界是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该书扉页所引《奥义书》上的一段文字表明,它与人类学的路数是一致的: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

在人类学功能论者看来,地方(尤其是共同体)的结构联系是真实可感的,因而其间的意义也是真实的。“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任何一方面,除非研究它和其他一切别的方面的联系,不易正当地明了。……这样就可以说,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一种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可以发现它的意义。”^[17]

社会史的结构联系就这样在具体的地方社会中与传统史学重视的抽象的制度性联系区别开来。

四、社会维度的谱系

“新史学”革命起初不过是抱怨旧史学的政治—精

英板式,革命一旦开始,不同的天地随之洞开。发展到1970年代的第三代年鉴学派直抒抱负:历史学不能满足于在这里或那里开辟一些新的视野,它要求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表现整体的历史^{[3] [P5]}。结果,鼎成社会史的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等社会维度衍生出相应的谱系。

首先是特定维度内部的谱系。勒高夫在说明社会史整体性时说:“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3] [P19]}在此,每一维度自成谱系:政治—日常构成事件维度谱系,精英—民众构成人物维度谱系,动态—静态构成状态维度谱系,价值判断—述而不作构成态度维度谱系……纲举维度的两端,就衍生出全景式的历史场面,是为整体史。

从历史维度的内部谱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历史维度之一端,传统政治—精英史在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地位。从研究领域上看,政治史与社会史存在着间接反对关系,所以英国学者G. M. 特里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提出,社会史即为“撇开政治的人民的史”,但是,“撇开政治”绝不意味着政治史与社会史在历史领域中的对立,而是互补。他所希望做的一切是去“公平处理”复原部分历史,那已经被严重忽视的日常生活史。对于特里维廉和他的现代同道来说,社会史补充并增补了传统史学^{[18] [P37]}。这样的“增补”恰恰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通过弥补民众—日常生活事件的缺项,而与精英—政治事件交相辉映,形成历史研究的整体。尽管一些中外社会史学者对政治史一直颇有微词,那不过是在发泄对其垄断地位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推翻垄断而相应地增添日常生活的内容,便显示了社会史的整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显示了整个历史的整体性。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想象在历史事件维度中缺失政治事件之维,正如日常事件之维的缺失一样。布罗代尔在写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一、二两部分之后,“经过长期犹豫不决”,认为还是不能缺少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事件、政治和人”。在他看来,“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事物并不是全部”^{[14] [下卷 P415]}。政治—精英与日常—民

众维度的融汇 必然带来整体历史的彼此照应 推进史学的更生。行龙立足于社会史 提出了民众一日常史研究中应有的精英—政治史照应:

社会史研究者 即使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 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也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19]。

历史维度谱系也出现在不同维度之间 往往牵一维而动他维。茅盾等人在 1936 年 4、5 月份 以即将到来的 5 月 21 日发生的“具有意义”的事为对象 向全国各阶层征文 留下了一部“一日史”。一日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要素极端 笔者发现 其他历史维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历史人物由社会精英变成普通民众 庞杂的个体扮演着无数的社会角色; 历史事件由重大变成日常 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生活; 生活空间由抽象的世界变成动具象的社群 通过众生互动活现出历史情境^[20]。“一日史”所凸显的维度谱系之间 桴鼓相应, 以鲜明的平民史观 区别于传统精英史观。历史维度谱系之间端绪呼应 合成整体史。需要辩解的是 按自然时间的尺度 这里的一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时 但此日太过平常 而与无数个日子几无二致 所以本质上它是一种长时段: 是日的事件曾经发生过 还会继续发生 变动缓慢 大多由平民百姓在他们的共同体里经历。如此 长时段—日常—民众—共同体—平民史观……的谱系形成了。

事实上 这样的谱系还在伸延。当史家开始关注社群百姓的日常生活时 立即发现史料的缺乏——传统历史编纂很少以它们为记注对象; 年鉴学派说 文艺素材可以作为史料 后来的社会史学者将仪式、口传、影像、实迹等非文献资料纳入了史料范围。问题接踵而至: 这样的史料需要对其中的虚构、想象等成分进行滤化; 如何滤化? 传统史学缺少相应的处理手段 而勒高夫提出“优先与人类学对话”^{[3] [P36]} 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昭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 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21] [P76]} 因此 在社会史学者那里 跨学科对话显得尤为迫切。这样 非常规史料和跨学科的增加进一步拉长了上述历史维度谱系的清单。如果对照另一份清单 社会史的革命性愈加鲜明: 短时段—政治事件—大人物—精英史观—抽象空间—常规档案—史学理论……

社会史维度之间的谱系固然凸显了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性 然而, “纯粹的(行为—) 经历史从根本上说要比纯粹的(过程—) 结构史更为片面与抽象”^{[5] [P85]} , 一

部分社会史学者因为太过强调社会史维度之间的自身联系 结果出现了所谓的“碎片化”现象。

最古老的观点认为 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 这种历史所包含的内容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和另一些制度的支配 因为这类制度是各种专门史所要研究的内容。这是把社会史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历史。伴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一个问题是 那些研究妇女、家庭、闲暇状况和教育的历史学家缩小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并把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发展为一些专门的学科。

在这里 社会史力图摆脱“制度的支配” 而自绝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以外”, “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 自划“专门的学科”牢笼, 一句话, “由于把政治、经济等各种观念排斥在研究的范围之外 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9] [P145]}。这就是“行为—经历”史的现实 而摆脱目前困境、赢得历史的整体性胜利的另一半虎符却掌握在传统的“过程—结构”史手里。科卡说 两种历史的现实“不是相合关系而是相交关系”: 社会史没有个体的“行为—经历”史可以说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反过来 社会的“过程—结构”史又不能在“行为—经历”史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它是远远大于“行为—经历”史的。在“行为—经历”史内部形成的“综合性阐述” 终究还是个体意义上的 不能作为另一选择来取代传统的“过程—结构”史^{[5] [P82]}。

历史的否定注定要走过这一段: 不向特定的社会史维度倾斜 无以区别于传统史学; 与传统史学维度的过分离异又导致了史学的碎片化 而碎片的整理则最终有赖于社会史维度与传统史学维度的关联。综观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 不难发现 其目标指向非常明确, 那就是整体性: 前一个否定为了构建整体性 后一个否定为了完善整体性。

五、结 语

革命干劲高涨的社会史 由要素到结构而维度 从部分到全面而一般 由分化至自立而回归; 全方位的变化正在进行时。仅此而言 它已经足以区别于传统史学。循着社会史的逻辑 把握其特征, 一些史学的论题便不觉得怪异, 一些史料的应用便不会被横加指责, 一些学科的借鉴便显得必要 总之 它们是顺理成章的, 是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顺理成章。

如今的社会史正处于十字路口 对社会史的各种指斥 尤其是所谓“碎片化”, 可能会让有些人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 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显得十分重要。其实 揭示社会史的特征只是面对问题的必要步骤 下

面该做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 Inkeles) 界定概念及其特征的方法对我们颇有启发: 首先要问“创始人说了些什么?” 是为“历史的途径”; 接着问“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 称为“经验主义的途径”; 最后当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 即“分析的途径”^{[22] [P1-2]}。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既往经历已经内含了最重要的“理性的指示”: 完善社会史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 [1] 鲁滨孙. 新史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3] J. 勒高夫 等. 新史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4] 约翰·托什. 史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5] 于尔德·科卡. 社会史既是结构史又是经历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9] 蔡少卿. 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10]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1] 陈衡哲. 西洋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 [12]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视野、角度与方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13] 衣俊卿. 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14] 费尔南·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5] 费尔南·布罗代尔.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 [16]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蒙塔尤: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7] 拉德克利夫·布朗. 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A]. 拉德克利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18]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新旧历史学[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19] 行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 [20] 小田. “一日史”的意义[J]. 河北学刊 2010(6).
- [21] 查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2]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 社会学是什么?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History

XIAO T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What is meant by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history? Amo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held by different people, there is the noticeable tendency of viewing social history as being developed centering on the perfection of “historical structure” narrativ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understanding in an institutional sense, social history gives greater emphasis to essential daily life factors in a personal sense, which are seen as the basis in determining the boundary and key factors of social structure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primary aspect of the integration lies in enriching the related daily life factors as much as the social boundary permits in order for history to approach comprehensiveness. To better reveal the deep structural connections among various daily life factors in the local society (such as community typically) and to make history more capable of embodiment make up the essence of the second aspect of the integration. To establish more visibly the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s within and among the history dimensions such as people, events, time and space so as to turn history into a continuum is the key idea of the third aspect. Social history which aims at integration is to be distinctly distinguished from traditional history from all these aspects and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ational indication to its own future.

Key Words: the social history; integration; soci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